

# 中共党史 中国革命史

讲 座

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编

一九八七、八

# 中共党史 中国革命史

第二版

中国革命史

第二版

## 目 录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	李 樾 ( 1 )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若干问题 .....	戴鹿鸣 黄修荣 ( 15 )
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	汪其来 ( 37 )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两次历史性转变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	刘经宇 叶心瑜 韩泰华 ( 49 )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 .....	王 洪 王秀鑫 刘振起 ( 66 )
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和国民党失败的历史必然性 .....	王 沛 ( 83 )
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在中国 .....	沙健孙 ( 100 )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 .....	孙瑞鸾 ( 116 )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 .....	孙瑞鸾 ( 130 )
建国三十八年来经济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教训 .....	孙怀阳 ( 141 )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 .....	周承恩 ( 147 )
正确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	王年一 ( 158 )
红卫兵运动及其历史教训 .....	苏采青 ( 172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 .....	王梦奎 ( 191 )
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历史考察 .....	庞 松 韩 钢 ( 214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 .....	王洪模 ( 232 )

#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 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李 越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央对党的产生重新作了科学概括，明确党的指导思想和阶级性质，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澄清了在国内外流行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种种错误说法，是有重要意义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科学概括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的根本原理，完全符合历史实际。让我们从理论和实际这两个方面，对这个问题作一些再探讨。

共产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它正确地揭示了党的阶级性质和思想基础。列宁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就是引导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创立的革命理论，阐明了这种结合的必要性，指出了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俄国建党时期，列宁曾经精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问题。1899年，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一文中说：“在欧洲各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最初都是互不相关的。工人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组织罢工和建立工会，而社会主义者则站在工人运动之外，著书立说，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要求用更高的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这种制度。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互不相关，使得两者都软弱无力，难以发展：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同工人斗争相结合，就只是一种空想，一种善良的愿望，对实际生活不会产生影响；而工人运动则只会流于零散状态，不会有政治意义，也不会得到当时先进科学的阐明。因此我们看到，在欧洲各国要求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趋向，愈来愈明朗化了。这样结合起来，工人阶级斗争就成了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摆脱有产阶级剥削的自觉斗争，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高级形式——独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政党也就产生了。”列宁的这段话说明了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相互脱节所造成的危害，说明了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说明了党是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以后，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分歧，主要是由于“经济派”的干扰，工人运动脱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在脱离工人运动的情况仍然存在。工人运动脱离社会主义，表现为有人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但是关于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目的和政治任务却根本不向工人解释或解释得很不够。社会主义脱离工人运动，表现为有些社会主义者认为反对政府的政治斗争应该由知识分子单独进行，因为工人只能进行经济斗争。这种情况的危

险在于可能削弱俄国工人运动同党的关系，而党的迫切任务是要巩固这种联系。

1900年11月，列宁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中明确提出：“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党应该实现的任务就是：“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

后来，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这部书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基础），深刻地论证了党是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从理论上详尽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不能从工人阶级自发运动中产生出来，而是从科学中产生出来的；必须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把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这样才能造成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牢固基础。

所谓社会主义学说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列宁曾经有过这样的解释，他说：“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是伟大的革命家，而且是伟大的科学家，他们之所以能够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就是他们掌握了人类文化知识的优秀成果，并且使它同工人运动牢固地结合起来。如果只有工人运动，不利用人类文化成果去科学地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论证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那只能产生形形色色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贬低社会主义意识在工人运动的作用，摒弃必须把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原理，则是产生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

列宁在《怎么办？》和其他著作中还科学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是一个客观的、有规律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出现，要具有一定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是：一、要有开始进行“处于自觉性萌芽状态”的自发性、群众性斗争的工人阶级。二、要有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工人阶级中间去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列宁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从外部、由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传播到工人中间的，这是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过程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正是这样一个客观的、有规律性的过程，并且具有列宁所指出的这个基本特征。注意到这一点，对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十分重要的。

## 二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产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产阶级成长壮大，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出现在帝国主义在华企业中，随后又出现在清朝官僚所办的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中。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约有10万人。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些鼓励创办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条例，袁世凯窃取北京中央政权后也不得不给资产阶级一些从事实业活动的自由和权利，民族资本开始出现建厂开矿的热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从西方各国的商品输入急剧减少，而出口有所增加，这种情况为民族资本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机会。从1914年到1919年的五、六年间，民族资本新设厂矿比1894年到1913年近二十年间超过一倍。这时，民族资本在全国产业资本中的比重，虽然只占20%

弱，但这毕竟是我国民族工业产生以来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

辛亥革命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进一步发展。1914年，产业工人增加到100万人以上，到1919年已增加到200万人左右。随着无产阶级队伍的迅速扩大，工人的斗争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从191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有记载的罢工共130多次，超过了辛亥革命以前数十年的总和。这些罢工以经济斗争为主，也开始出现了具有政治性的罢工和斗争。如1916年法国帝国主义在天津企图侵占接连法租界的老西开地区，天津人民奋起反抗，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斗争坚持了五、六个月之久，迫使法帝国主义不得不放弃侵占老西开的计划。这些斗争表明，无产阶级的觉悟在逐渐提高，力量也在不断增强。总起来看，这个时期的工人斗争大多数还是自发性质的经济斗争，工人群众的组织还处在秘密结社或封建帮会势力的影响之下，无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仍然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但是，正如列宁所预言的：“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起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

上海等地近代工业产生、发展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将在第三个问题里介绍，所以这里讲的只是一些概况。

## 第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的政权很快落到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手里。军阀统治使人民遭受到严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加上连绵不断的军阀战争，给整个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使中国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首先是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前途和希望。毛泽东后来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这段话精辟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特点。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首先从书本上获得，而是首先从十月革命活生生的事例中领悟到，在一定的意义上，后者比前者更为有力。

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十月革命中认识了什么呢？最主要、最根本的是以下两点：

一、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受到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欺侮和压迫。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各族人民进行了长期的、前仆后继的斗争，但是，所有的反帝斗争和革命运动，没有哪一个不是受到帝国主义的干涉和镇压而失败的，这固然是因为中国经济落后，缺乏物质武器，然而最缺乏的还是抗御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怎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这是中国人民长期痛苦思考着的问题。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第一次看到在世界上出现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俄国人民违反帝国主义的意愿，建立了苏维埃国家。这个国家宣布废除对中国的平等条约，同情并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使中国人民看到自己的反帝斗争不再是孤立的，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胜利的信心。

二、辛亥革命失败以后，许多人长期追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破灭了。在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走不通，还有什么道路可走？人们陷于苦闷彷徨之中，找不到出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以后，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逐渐地越出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的范围，开始接受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决心“走俄国人的路”。

经过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先进青年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国家命运岌岌可危，更加感到封建军阀反动统治的腐败黑暗难于忍受，他们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重新探索中国的前途。全国各地鼓吹新思潮的刊物犹如雨后春笋，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就出版了400多种。当时被人们当做新思潮来介绍、宣传的社会主义学说是很庞杂的，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流派，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主义等等。在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以它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了、教育了众多进步青年和革命者，使他们确信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最好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什么在较短的时间内，在能够读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并不多的情况下，信服地接受了这个科学真理呢？是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他们是“在匆忙之中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下面让我们看看几种不同类型的先进知识分子，通过不同途径寻找革命真理的过程，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一、通过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鲜明对比，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良方”。

在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不少人曾积极参加或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及民国成立后的反帝反军阀斗争，斗争的一再失败，使他们感到山穷水复，十月革命的胜利，才看到中国未来的前途，因此能够比较快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林伯渠、吴玉章等都有过生动深刻的回忆。

林伯渠说：“这些时候，一些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时常苦恼着我。从同盟会起到民国成立后十年中，自己亲自参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经过多少的挫折失败，也流尽无数志士的鲜血，然而反动势力仍然是此起彼伏地统治着中国，政治的澄清总是那样遥遥无期。虽然对于造成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还不完全了解，但总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应该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究竟怎样的干下去才能把革命贯彻到底呢？当时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作出圆满的答案是不容易的，似乎尽照着欧美式的议会政治很难完成这个任务。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我得到一些新的启示，知道了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知道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个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的。这些发现是从当时在北京和日本东京几位朋友，其中之一就是李大钊同志寄给我的一些社会主义的宣传品里得到的。……就依靠这些零粹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消灭了我的疑虑，渐渐地把握住真理。”（《林伯渠自传》）

吴玉章说：“从1911年辛亥革命起，到1919年五四运动止，这是一段艰难困苦的斗争岁月。当时，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革命党的组织陷于土崩瓦解，中国的天空上布满着黑暗的阴云。”严酷的现实使他开始认识到：“这样看来，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但是我们依靠什么力量呢？究竟怎样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呢？这是藏在我心中的迫切问题，这些问题时刻搅扰着我，使我十分烦闷和苦恼。”“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

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吴玉章回忆录》）

## 二、通过实验活动，辨别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

互助主义和新村主义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物，它们提出的一些改造社会的美妙设想，对于抱有改造社会的善良愿望、而又害怕激烈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很有吸引力的。1919年底，北京、天津、武汉、南京、上海、长沙、广州等地的一些进步青年，成立工读互助团一类的组织，“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他们认为“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产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步推广，“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便能逐渐实现。他们希望把工读互助团推广到全社会，实行“平和的经济革命。”但是，成立不久就发生经济困难，加上团员观点分歧，人心涣散，很快宣告解散。新村主义者模仿日本九州的新村和美国的劳动村，试办中国的新村，结果也是昙花一现。

工读互助团和新村运动的失败，对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人是一次非常实际的教育，他们开始认识到“全社会的经济组织不从根本上改革，其余的改革都是无效的。”“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之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或新村。”他们在总结了经验教训之后得出结论：“我们因此更信共产主义”。

## 三、通过对各种主义和学说研究、分析、比较、鉴别，认定马克思主义是救治中国的真理。

五四爱国运动后的一两年，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思想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有愈来愈多的人向往社会主义，但开始时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并不十分清晰。他们怀着改造中国的强烈愿望，对各种主义和学说进行研究、分析、比较、选择，希望从中找到救治中国的真理。

1920年2月，蔡和森去法国勤工俭学，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研究国际工人运动的情况。1920年夏，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几个月内已搜集到各种重要小册子约百种，猛看猛译，经过“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他认定阶级斗争一无产阶级专政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

毛泽东在1920年3月曾经向人表示：“现在我对于各种主义、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个比较明确的概念。”可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经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对各种主义、学说，比较鉴别，1921年1月2日，他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明确表示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他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 四、通过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开始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引起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恐惧，下令严防和查禁“过激主义”，但是他们阻止不了科学真理的传播，反而使更多关心国家命运的人倾向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站在资产阶级右翼立场上的知识分子出面反对马克思主义。

1919年下半年，胡适发表文章，他在反对“空谈外国进口的主义”的幌子下反对马克思



主义，宣扬改良主义，要求人们“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鼓吹中国不需要经过一次社会革命，就能够解决一个个问题。李大钊批判了胡适的论调，指出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这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不谈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是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够根本解决中国问题。“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争论。当时，改良主义思潮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这场争论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起了积极作用。

在这以后，正当一些城市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建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时，1920年11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张东荪、梁启超挑起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争论。他们的说法是，中国经济落后，缺少真正的劳动者，绝对不能建立共产党，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他们自称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赞成社会主义理想，但是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就是穷，救治的办法是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纷纷撰文予以批判。马克思主义者分析中国的社会情况，指出中国经济虽然落后，但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在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下，中国社会黑暗到了极点，“除了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在中国“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的团体”，建立共产党，不仅有必要，而且有条件。马克思主义者承认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必须发展实业，但是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早已是“万国的市场”，国际帝国主义是不允许中国发展自己的实业的，中国的出路在于社会主义。这是一次关于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的争论。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回击下，以提倡基尔特社会主义为名而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人们败下阵去。

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来自资产阶级方面的反动思潮时，还反对了那些在西方国家同工人运动有联系的错误思想，即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受这两种思想影响的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人认为不要阶级斗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是可取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想用资产阶级议会来为劳动者服务不啻“与虎谋皮”，中国工人阶级根本没有进行合法的议会斗争的可能，这种修正主义思想只是极少数知识分子的空想。

无政府主义是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现状，无政府主义很适合他们的口味。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国家、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他们不懂得社会发展规律，企图超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他们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严肃的批判，着重阐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必须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的糊涂观点，只能使他们走入歧途。马克思主义者还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在分配问题上的平均主义思想，并着重批判他们主张的“绝对自由”，指出在人类社会，自由总是相对的，所谓“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经过这次批判，有许多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革命青年抛弃了这种错误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

从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一、两年间，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不同途径，接受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总起来说，当时他们

能够读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是不多的，都还没有能够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中国情况，他们的理论准备不足，这是一个弱点。但是，他们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就投身实际斗争，包括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思想斗争，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努力与工人阶级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 第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从酝酿准备到正式建立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经过五四运动，革命知识分子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第二阶段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有组织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准备了条件。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六月五日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样，运动突破了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范围，形成了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革命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的力量，他们努力接近工人群众，到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中国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这种认识在工人群众中逐步推广，中国工人阶级便逐步地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经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中国革命便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中国革命不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了。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说来，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在于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稍后蔡和森、毛泽东也开始讨论建党问题。1920年3月，李大钊等在北京大学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团结教育了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为建党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他们在准备建党的过程中，得到了共产国际批准派出的俄共党员小组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准备，1920年8月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建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且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活动的中心。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旅法勤工俭学的革命知识分子和旅日青年中也成立了这样的小组。

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结果。前面已经讲过，这种结合是一种客观的、有规律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出现，要具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共产主义小组之所以能够在上海等六个地方建立起来，正是因为这些地方已经具备这种条件：

一、这些地方都是产业工人比较集中，工人运动有了一定发展的城市。

二、这些地方有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其中有不少是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他们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革命活动。

这两个条件就是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下面把上海等六个城市的近

代工业、产业工人、工人运动、革命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材料简要地介绍一下，供大家研究共产主义小组问题时参考。

上海是我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工人运动的中心。鸦片战争后，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从1853年起，外国资本陆续在上海开设船厂、丝厂、纱厂、烟厂和电灯、电话等企业，我国的第一代产业工人由此产生。1862年以后，清政府设立制炮局、江南制造局、机器织布局 and 轮船招商局。随后，民族资本的丝厂、面粉厂、机器厂、印刷厂等也陆续兴办，产业工人的队伍逐渐扩大。为了反抗中外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工人自发的罢工斗争时有发生。1918年4月到1919年4月，上海纱厂工人多次举行罢工，每次罢工人数都在3000人以上。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上海工人阶级率先举行政治大罢工，推动了全国运动的发展。据1920年统计，上海有产业工人50万人。

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20年初，陈独秀从北京回到上海后，《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沪。陈独秀同在商务印书馆、《民国日报》、《星期评论》等单位工作的沈雁冰、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陈望道以及从日本回国的李达等人，办刊办报，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1919年10月，李汉俊在《最近上海的罢工风潮》一文中指出：“我们自身应该从精神上打破知识阶级四个字的牢狱，图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一致团结，并且一致努力。”1920年春，陈独秀多次撰文，要求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加强同工人、店员的联系。4月2日，陈独秀等人参加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陈独秀作了《劳动者的觉悟》的著名讲演，称赞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指出劳动运动分两步走，最终“做工的劳动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领导地位。”5月，《新青年》出版“劳动节纪念号”，陈独秀积极组织工人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

在北京，1879年中国商人开办门头沟煤矿，不久被美国资本侵吞，采用机器生产。1883年，清政府创办神机营机器局（即兵工厂）。1901—1906年，外资和清政府在京汉、京绥铁路沿线陆续创办了一些工厂。1905年以后，民族资本开始设立火柴厂、印刷厂、电灯公司、面粉厂等。辛亥革命以前，北京近代产业工人有几千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的面粉、造纸、织布、地毯、酿酒、制革工厂发展较快。1919年五四运动前，近代产业工人有两万人，人数虽少，但比较集中，如长辛店车辆修配厂有3000工人，丹凤火柴厂有1000工人，这种情况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团结。此外，还有建筑工人、手工业工人、人力车夫、市场苦力、店员等十几万人（当时北京人口为93万人）。从1910年到1919年五四前，制革、印刷、火柴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反对无偿加班多次举行罢工斗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首先是从北京地区开始的。1918年到1919年元旦，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著名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热情讴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四运动以后，在北京出版的宣传新思潮的报刊有三、四十种，虽然创办人的立场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在介绍马列主义著作、进行社会主义讨论等方面非常活跃。李大钊培养教育了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等一批年轻马克思主义者，并引导他们走同工人结合的道路。李大钊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去，非把知识分子和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知识分子固然是“民众的先驱”，但必须把“三五文人的运动”变为“劳工阶级的运动”。1920年1月，在李大钊的组织下，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进行调查，工人的悲惨生活状况，

“使大家相顾失色，叹息不止，都表示一种极伤心和不平的样子。”这时，《新青年》还刊登一份社会调查表，提出向工农调查的详细项目。4月，邓中夏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团，经常到长辛店向铁路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在这以后，一些革命青年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下决心到工人中间进行工作。

武汉是我国近代工业基地之一。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汉口被辟为通商口岸。从1863年起，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在这里开设工厂，到1920年多达30余家。1890年以后，武汉又成为清朝洋务派官僚集中建厂开矿的地方，先后开办铁政局、枪炮局，开采大冶铁矿，以及织布、纺纱、制麻、缫丝四局。1894年，汉口有工人13000人，仅次于上海。1896年以后，民族资本也开始投资建厂。1920年左右，湖北全省有各类工厂1000家以上，产业工人近30万，其中，武汉地区有10多万人。1912至1917年间，汉口租界人力车夫、汉阳兵工厂工人和武汉碾米工人都举行过罢工斗争。五四运动中，爱国学生遭到反动军阀的血腥镇压，武汉各轮船水手、火夫举行同盟罢工。从1919年5月至12月，武汉工人罢工有13次之多，其中全行业的同盟罢工有11次，罢工带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

五四运动后，先进知识分子创办社团、刊物、学校，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到工人中进行调查研究。1920年2月，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肖楚女等创办利群书社，它是当时武汉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也是青年活动的重要场所。1919年7、8月，董必武、张国恩等从上海回到武汉，创办武汉中学，培养革命青年。先进知识分子深入工厂，接近工人群众，进行社会调查，在《新青年》等杂志上，先后发表了《武汉工厂调查》、《武汉工厂纪略》、《汉口苦力状况》、《武昌五局工人状况》等调查报告。创办平民教育是先进知识分子联系工人群众的另一个重要途径，他们成立了汉口通俗学校、武汉平民学校，招收船员、手工业工人和贫苦青年入学。

长沙，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湖南出现了近代工矿和近代产业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抢购军火原料，促使湖南的铋业、铅锌业发展很快。1916年新化锡矿山有工人十万人，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有工人5000人。战后矿业迅速衰退，工人大批失业。1920年，全省尚有产业工人近十万人，其中省会长沙有产业工人二万人。随着工人阶级的壮大，工人的自发斗争日益频繁，1916年到1919年间，平江金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箩夫工人、人力车工人、水口山工人都举行过罢工。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湖南的先进分子开始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何叔衡等人组织了新民学会。五四运动中，邓中夏由北京回到湖南，向毛泽东、彭璜等详细介绍了北京学生的斗争情况。彭璜等组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总罢课，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店员等都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是宣传十月革命、宣传新思潮最有力的刊物。1920年，毛泽东、彭璜、何叔衡等又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等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

在山东，1872年德国人在烟台开办蛋粉厂，缫丝局，开始出现近代工业。1875年以后，清政府在济南建立山东机器局，开办枣庄煤矿、淄川铅矿等。甲午战争以后，德国侵占青岛并取得山东路矿特权，在胶济铁路沿线办厂开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进占山东，日资企业迅速发展；民族资本也有所发展。近代产业工人在战前有4万人，战后发展到约10

万人。这些工矿企业和产业工人集中在胶济、津浦铁路沿线的济南、青岛等城市。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本家三重压迫的山东工人不断进行反抗斗争，五四运动爆发后，把山东工人运动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五四运动的直接起因是“山东问题”，山东人民更有切肤之痛。5月22日，济南工人和市民数万人集会，工人代表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山东的罪行，“台下听者发指眦裂，号哭之声远闻数里”。6月5日以后，济南工人举行罢工，工人们组织了“劳动五人团”、“救国十人团”等，显示了反帝反封建的坚决性。

地处京津宁沪之间的山东济南地区，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流传较早。1919年夏，王乐平等创办齐鲁通讯社贩书部，1920年扩充为齐鲁书社，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步书刊的重要阵地。1920年夏秋之际，王尽美、邓恩铭等秘密成立了“康米尼斯特学会”（即共产主义学会），组织进步青年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

广州，鸦片战争后英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府开辟广州为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势力随即侵入广东。1845年起，英国人在广州、香港经营航运、船舶修造、机器等行业，雇佣中国工人，由此产生了广东地区的第一代产业工人。随着航运业的发展，海员、码头工人也发展很快。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清朝政府洋务派官僚开始在广东兴办军用企业和官商合办企业，随后民族资本企业也开始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广州地区的纺织、橡胶、碾米、榨油、火柴、印刷等行业不断兴起或扩大，工人阶级队伍也随之发展和壮大。1920年，省港工人总数约为50—60万人，其中近代产业工人约为30万左右。省会广州有产业工人10万人，加上手工业工人、店员等共约20万人。

省港工人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传统，1857年，为反对英法联军侵略广州，1884年为反对法国侵略者发动中法战争，香港工人曾举行罢工。广东工人阶级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2年，为反对资本家剥削和虐待工人，顺德丝厂女工近5000人举行罢工，其规模之大为前所未有。五四运动以后，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1920年，广州和香港工人举行罢工达17次以上。

在五四运动中，广东涌现出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如杨匏安、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等，还有在日本留学的彭湃、在北京学习的谭平山先后回到广州，他们是广东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者。林修梅写了《社会主义的我见》等文章，公开宣告：“我相信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在今日中国的社会情形最为合适。”他也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了贡献。

以上材料说明，上海等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不是偶然的，不能仅仅理解为是少数革命知识分子相互联系、进行活动的结果，或是“共产国际代表”帮助建立的结果；而是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是一个客观的、有规律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出现，要具有一定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这些地方正是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所以才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

现在简单解释一下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和性质问题。

当时，国内外的这些组织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后来才被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实质上共产主义小组就是党的组织。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人，绝大部分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承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且努力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在实际斗争中逐渐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虽然，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人中，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混进过个别标榜进步的地主分子和投机分子，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占绝大多数，这一情况决定了这

些组织的性质和工作方向。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是1921年7月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它的工作方向、即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的主要工作，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方面的材料比较常见，所以只简单地说一下。

各地小组采取出版书刊、成立研究会、利用学校讲坛等多种方式，建立并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上海小组将《新青年》改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并创办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上海、北京小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翻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其中有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等。武汉小组创办《武汉星期评论》，济南小组创办《励新》半月刊，广州小组把《广东群报》作为机关报。

北京小组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集合信仰社会主义的同志研究并宣传社会主义。长沙小组通过新民学会、俄罗斯研究会，并开办湖南自修大学，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高等师范等学校开设“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等课程，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广州小组利用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主办的“宣传员讲习所”等合法组织，向学员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

与此同时，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采取多种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教育工人、组织工人的工作。首先是出版通俗刊物，当时最著名的是上海的《劳动界》和北京的《劳动音》。《劳动界》用通俗易懂的文字，结合工人生活和斗争的具体事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同时刊登工人来稿，反映工人的要求，被誉为“工人的喉舌”。《劳动音》明确提出，宣传马克思主义不应“只向知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作实际的运动”，努力促进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北京小组以“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名义，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其他各地小组也创办了工人半日学校、工人夜校、识字班等，用这种办法广泛联系工人群众，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培养工人骨干，为成立工会打下基础。

1920年11月，上海成立机器工会，这是在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工会组织，随后又成立了印刷工会、纺织工会。这时上海纱厂工人、电车工人举行罢工斗争，《劳动界》等刊物发表文章，声援罢工工人。1921年五一劳动节，长辛店铁路工人举行庆祝大会，通过了组织工会的决议。5月5日，汉口人力车夫为反对车行加租，在武汉小组的领导下举行罢工，提出“奋斗，争自由，争人格”的口号。长沙、济南、广州的一部分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也建立了工会，逐步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

总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开展的各项工 作，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一大以后，党经过领导广泛的工人运动而和本阶级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二大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中国共产党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完成自己的创立过程。

### 三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科学概括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的，也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但是，在港台、国外的史学界中，有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出种种违背马克思主义、违背历史事实的说法。例如：

一、认为中国工人在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极其落后，在思想上不可能达到理解和接受马列主义基本思想的高度，共产主义运动是共产国际“强加”给中国的。换一种说法是，第三国际代表来华输入马列主义和移植共产党。

二、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是一些知识分子，建党时没有多少工人党员，中国共产党不是无产阶级政党。

三、还有一种说法是，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同工人运动结合，而是同农民运动结合了。

此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71年7月1日发表过一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的文章，那里面提到，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运动结合的产物。”

以上种种，说法各有不同，但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否认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些说法曾经在一些人当中造成认识上的模糊或混乱，所以有必要加以澄清。

一、共产主义运动是共产国际“强加”给中国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强行“移植”的。从我们党成立时起，在一些仇视共产主义运动的入中间，这种论调便久传不绝。饱受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侵略压迫的中国人民，历尽坎坷，痛苦求索，在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之后，才懂得只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在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出的俄共党员小组来华以前，李大钊、陈独秀等已经开始探讨建党问题；蔡和森更是在和共产国际毫无联系的情况下，在和毛泽东的通信中提出建党主张。这段历史前面已经介绍过，这里再补充一些史实：

中国共产党是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成立的，所以有些地方的初步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者并不知道这个消息。但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们也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象俄国那样，建立共产党。于是他们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方式，进行建党活动或尝试。

1921年7月中旬，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林育英等20余人在湖北黄冈林家大湾开会，讨论建立革命组织，有人提议把这个组织叫做“波社”，即“波（布）尔什维克”之意。会议决定成立共存社，它的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予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从这个宗旨看，就是共产党性质的组织。

据吴玉章回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因四川地处偏远，我们还不知道，……我于是便与杨闇公同志等在1923年冬秘密组成了‘中国青年共产党’，作为领导革命斗争的机构，并发行《赤心评论》，作为机关报。”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到，在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后，在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在不约而同地探索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殊途同归，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已经是革命的需要，历史的必然。所谓“强加”、“移植”云云，是根本违背历史事实的。

关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前面也已经讲过，这里还有必要剖析一下所谓“中国工人落后不能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事实恰恰相反。列宁曾经说过，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本能地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中国工人阶级也是如此，他们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境遇非常悲惨。他们从俄国十月革命学到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列主义，中国工人阶级认识到这是能够使自己获得解放的唯一科

学真理。美国作家斯诺根据对旧中国的深入观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十至十二岁的童工在晚上时常被关起来，睡在他白天操作的机器之下的破布堆里；人们不必要有锐利的观察力，便可以明白为什么《共产党宣言》会被这个国家的人民奉为圣经。（上述有关童工的情况，我在外国人势力范围下的上海中国人的商店中也可以看到）。此外，中国人所遇到的西方民主，只是在其担任了外国警察力量的角色，及保护以暴力夺取于中国的‘权力与利益’这几方面；因此，人们也无需研究，便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人立即可以完全接受马克思对西方民主的伪善所作的藐视性的抨击。”（《斯诺文集》第4卷）斯诺的这段话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为什么本能地倾向马克思主义。

二、“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是知识分子，不是无产阶级政党。”这种说法不正确。建党时，革命知识分子作出重要贡献；建党初期，知识分子党员比较多，工人党员比较少，这是事实，但不能因此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无产阶级政党。

（一）党员的社会成分不能决定党的性质。列宁说过：“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是谁领导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刘少奇在《论党》中全面地论述了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是由以下一些条件决定的：一、党产生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接受了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中最优良的传统；党是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与工人运动有不断的联系。二、党一贯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三、党有着无产阶级的纲领和政策。四、党有着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五、在实际斗争和党内生活中，党员在思想上组织上受到严格的教育与锻炼。六、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实行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改变其原来小资产阶级的本质，使他们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性格。刘少奇说：“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一切，决定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而我们党的总纲及党的组织原则，则保障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路线在党内占居统治地位。”

（二）建党时期，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下首先参加党的人，不管他们的社会成分如何，都是一批职业革命家。列宁说过：“革命家的组织（指党的组织——引者）所应当包括的首先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既然这种组织的参加者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么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更不用说他们各种不同职业之间的区别了。”“职业革命家，不管他们由学生或由工人造就出来的都一样。”（《怎么办？》）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情况正是如此。当时，参加党的首先并且主要是一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立志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有没有社会职业，他们的社会职业是否各有不同，但都是以从事革命活动为主的、即被列宁称为“职业革命家”的那种人。他们虽然是知识分子，但是承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且努力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在革命实践中逐渐锻炼成为具有高度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这样，在他们身上知识分子与工人的区别当然已经完全或基本消除了。

根据以上两点，所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党员多，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是一个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三、“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同工人运动相结合，而是同农民运动相结合。”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或者是有意抹煞党的创立时期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基本史实。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一大以后，党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密切了党与无产阶级的联系，建立并巩固了党在无阶级中的组织基础。党成立后，就非常重视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二大前夕，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关于党务工作计划，明确规定“多收工人党员，务求全数一半以上。”根据三大的材料，1923年上半年发展的党员，工人成分的占65%。1926年10月、11月份，广东、北方、上海、湖南等区的党员总数中，工人成分的约占60%。1927年4月五大时，党员总数为57,963人，其中工人成分的党员占53.8%。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无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但是，党的宗旨和纲领没有变，吸收党员的标准也没有变。在农村环境中，党内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急剧增加以至占了多数，无产阶级政党完全有能力改造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使他们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从而使党始终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个无可置疑的事实。

四、“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运动结合的产物。”这种提法是不准确的。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运动”，内容很不明确，没有指出这种革命运动的阶级性质，它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运动，民族解放性质的运动，还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运动。这个问题不讲清楚，就会把党的阶级性质搞得模糊不清。列宁说过：“我始终坚持在谈到我们党的阶级性质的地方，用‘无产阶级’一词代替‘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一词。”（《关于党纲的历史》）这就是说，在讲到党的阶级性质时，必须是十分明确而不能含混的。

（以下文字为模糊不清的扫描内容，无法准确识别，故在此处省略。）